

王德华 著

屈原精神 及其文化背景研究

中华文史新刊

中华书局

ZHONGHUA WENSHI XINKAN



此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屈原精神的诸多层面作了本质的把握与提升。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对屈原作品作了文本的综合研究，下编探讨了屈原精神形成的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屈原所具有的自我意识觉醒的理性精神——其所表现的对自我与社会双重固持的品性是屈原精神的基点，这一基点最为本质地反映了人类于自我于社会的精神需求。这是我们对屈原精神反思所得到的启示，也是屈原精神之所以沾溉后世，后世之所以对屈原精神产生共鸣的主要原因。

中华文史新刊

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

王德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王德华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101-04147-7

I. 屈… II. 王… III. ①屈原(约前 340 ~ 约前 278) -
文学研究②楚辞 -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843 号

书 名 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著 者 王德华

责任编辑 张文强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月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月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³/₄ 字数 336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147-7/K · 1731

定 价 30.00 元

序

王运熙

在近年来我所看到的高校博士研究生论文中,王德华同志的《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是富有新意和力度的一部著作。

本书重点探索屈原辞赋的精神,指出它具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忠贞爱国,另一方面还包含着强烈的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精神,屈骚精神的本质就是对自己和社会的双重固持的精神品性。作者又指出,屈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自己才能有高度的自信,其作品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执著精神和对自己道德人格的固持,其自我意识因蕴含了社会价值而显得崇高。这一对屈骚精神的阐释,不但显得新颖,而且由于多方面的论证,具有说服力。它对屈骚崇高精神是一种新的发掘和开拓,值得重视和称道。如众所知,屈原作品的思想、艺术及其精神境界,影响着中国世代代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即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其启发、哺育的意义。因此,对屈骚精神的深入挖掘和正确阐释,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书上编各章,分别剖析屈赋的各个篇章,作者广泛吸取了前人、今人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有所取舍,特别注意扣紧主题,发掘屈骚的精神本质,因而与一般的屈赋概论有明显的区

别,并显示出作者在分析作品时具有的敏锐观察力。下编各章,探寻屈骚精神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周代学术文化的大背景下,着重探索楚文化的特征、兴衰过程及其对屈骚精神生成的影响。这部分,取材广博宏富,论述深入而有系统。作者阅读了经部、史部、子部的有关典籍以及出土的文物资料,显示出她不但对先秦文学史熟悉,而且对先秦政治史、思想史、学术文化史等诸方面了解得相当深入,凭其敏锐的目光进行分析,作出了新颖而深刻的论述。这种功力,在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中,是不多见的,是难能可贵的。综观全书,作者既占有丰厚的材料,具有接近于老一辈学者的那种贯通文史哲的厚实工夫,又善于学习并运用欧美学者的文艺学、社会学、哲学等理论来观照、剖析屈原辞赋及其文化背景,使全书焕发出动人的时代光彩。所以说,此书是一部富有新意和力度的著作。

在近二十年中,作者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有着一段良好的历程。她先是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师从潘啸龙先生研读楚辞;之后进入湖南师范大学读硕士生,师从马积高先生学习辞赋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再到浙江大学读博士生,师从崔富章先生学习楚辞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在长期追随名师研究的过程中,她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掌握了治学方法,而且吸取了他们艰苦治学的精神。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她既有所建树的雄心,又有刻苦钻研的毅力。从这方面看,她和屈原执著追求理想的精神,有着某种契合之处。她付出很大精力写作这部著作,或许正是受到屈骚精神的推动和鼓舞吧?我衷心的希望,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榜样面前,在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领域,今后能陆续出现一批批既能传承古代优良传统、又富有新时代气息的优秀学术著作!

二〇〇一年六月

目 录

序	王运熙 1
---------	-------

导 论——屈骚精神研究的历史反思及本文研究之方法	1
--------------------------------	---

上编 屈骚精神的作品综合研究

第一章 《离骚》——屈子精神基点的追寻	17
一、首八句——屈子对自我的认知	17
二、认知与实践的结合	25
三、与女媭、重华的二次对话	
——屈子第一次的精神驳难	31
四、上叩帝阍、下求佚女——寻求实现的精神追寻	36
五、灵氛占卜、巫咸降神——屈子的二次精神驳难	45
六、长诗的结构与屈骚精神之关系	51
七、结语	56
第二章 《九章》——屈子一生情感与精神的实录	58
一、《九章》时地与屈子精神	58
二、《橘颂》——屈子青年时的自我期许	62
三、《惜诵》——“惜诵”与“发愤抒情”	70
四、《抽思》、《思美人》——流放汉北时的情感张力	79
五、《哀郢》——“哀己”与“哀国”的双重情感表白	91
六、《涉江》——精神与现实社会的决绝	100

七、《惜往日》、《悲回风》、《怀沙》 ——屈子的临绝之音	107
第三章 《卜居》、《渔父》——屈子的精神困境与 精神固守	132
一、《卜居》、《渔父》的文体、著作权及作年	132
二、《卜居》——屈子精神困境的揭示	135
三、《渔父》——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	140
四、《卜居》、《渔父》的对话体体制	146
第四章 《天问》——屈子的天人之思	149
一、对物质自然之天的疑问	149
二、对运命人格之天的疑问	159
三、对楚国国运的担忧	166
四、结语	169
第五章 《九歌》——对神的认知方式与屈骚精神	171
一、屈子改作《九歌》说与探视《九歌》的途径	171
二、《九歌》巫祭形式下对神的认知方式	178
三、屈骚精神与《九歌》对神的认知方式	188
 下编 屈骚精神生成的文化背景	
第六章 楚文化的特征及兴盛的原因	207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7
二、楚文化的精神气质	210
第七章 西周至春秋中期楚民族精神气质的形成	218
一、楚民族理性与个性兼融的精神气质——来自楚 民族与自然和社会的对象性关系的一种动态观照	218
二、楚国的政治思想与法制思想——“不从周”精神 特质的外在显现	233

三、楚国的制度文化——令尹(官制)与县制的楚文化 精神	246
四、楚庄王的霸业与楚国的出路——楚民族政治 性与民族个性精神的双重提升	262
第八章 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楚民族精神提升的失败	283
一、楚灵王“得天下”之心——对楚民族政治理性的一 种消解	283
二、悼王时吴起变法的失败——楚贵族政治的积弊难 返,楚民族精神提升失败的一种折射	301
三、悼王之后楚国的内忧与外患——楚国精神景象 的江河日下	318
第九章 屈骚精神生成的文化合力	332
一、楚民族精神特质的双向潜流与屈骚精神基点 的形成	332
二、战国时代的政治文化对屈骚精神形成的影响	341
三、文化合力产生的支点——屈子对南北文化与 诸子思想的创造性接受	359
第十章 屈骚精神形成的文化哲学背景	377
一、商周之际宗教的延续与变革	378
二、春秋战国天人相合的主体张扬与消解	386
三、春秋战国天人相分的“自力”特征	398
余 论——屈骚精神作为一种范型对后代的影响	429
一、屈骚精神的范型意义	429
二、屈骚精神作为范型对后代的影响	433
附录 汉代记载屈原生平事迹考论	440
主要参考文献及引用书目	469
后 记	477

导 论

——屈骚精神研究的历史反思 及本文研究之方法

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其蕴含的精神——屈骚精神,是极其丰富而富有生命力的,对后世的影响至深且巨。对屈骚精神的探讨,始终是历代治骚者的主流。最早对屈原《离骚》给予很高评价的是汉淮南王刘安,他认为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①可见,刘安主要是从屈原人格的高洁,即“志洁”和“行廉”来推崇“可与日月争光”的“屈骚精神”的。而班固主要是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否定了刘安的观点,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

^①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 1982 年 11 月第 2 版第 2482 页。

矣!”^①可见班固主要是否定了屈原高扬个性的精神。班固这一观点在南北朝颜之推、唐贾岛等人身上仍有所反映。其实在汉代,不仅班固不能接受屈原,就连写《吊屈原赋》的贾谊,“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②,为屈原立传的司马迁,傍《离骚》而作《反离骚》的扬雄,莫不对屈原的强烈个性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与不解。贾谊云:“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睇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③司马迁云:“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④扬雄云:“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歆以於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匝,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濊!溷渔父之铺歎兮,洁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⑤从他们的不解与同情中,见出屈骚精神中的个性精神与道家的避世思想及儒家的明哲保身哲学的矛盾与冲突。而班固对刘安所肯定的屈骚精神的指责,是“屈骚精神”在儒学独尊、经学一统的汉代必然出现的现象,这也预示着要使“屈骚精神”得到认可与继承,必须要对“屈骚精神”进行改铸,使其符合正统的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

① 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49—50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503页。

③ 贾谊《吊屈原赋》,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2494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503页。

⑤ 扬雄《反离骚》,见《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2版第3521页。

王逸是第一个努力这么去做的。在独尊儒术的时代,王逸要想对屈骚精神加以推崇,必须要对所谓屈原的过激的“言”与“行”给予合乎“经义”的解释。但不可避免的是,王逸对屈骚精神加以“经义”阐释的同时,就不得不抹杀屈骚精神中强烈的个性。王逸强调的忠贞直谏确实是屈骚精神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核心内涵,但把屈原定义为忠贞之臣,则又不免失之于狭隘。屈原对理想的执著精神,一方面包含了他忠贞爱国的内容,另一方面还包含着 he 强烈的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追求。屈原追求的是一种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高度融合,正是这种追求才使得屈原吟唱出卓绝一世的《离骚》,谱写了为后世俗儒、腐儒所不容的怨刺诗篇。如果说班固之迂在于以儒家观点否定屈原的个性精神,那么王逸以经义观点加以阐释的努力,却把屈骚的个性精神纳入了儒家经典范围之内,隐没了屈原忠贞伏节精神的个性内涵。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当时“经义”思维模式下必然导致的结果,同时还说明了屈骚精神远非儒家思想所能包蕴与阐释明了的。王逸用“经义”的观点驳正了前人对屈原善意的不解以及班固对屈原的歪曲与批评,对屈原人格、精神以最大限度的首肯,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虽然王逸之后,贬屈者时有,但屈原忠贞直谏的形象得以树立,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至宋代,对屈骚精神内涵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朱熹明确提出了屈原的“爱国”：“原之为入,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①由于宋代积贫积弱的国势及朱子自身的处境与心境,屈原的忠君被赋予“爱国”之新义,从此,屈原就与“爱国”联系起来了。由于封建

①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2页。

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

社会末期，国恨家痛屡发，后世治骚者联系己之身世之慨，无不把屈原看作是“爱国主义”的代表，对其“爱国主义”精神推崇备至。可以说，自汉至清，对屈骚精神的阐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强调屈原的人格精神和“忠君爱国”的精神。相对而言，屈原人格精神主要表现为屈骚精神中自我的一面；而“忠君爱国”的精神，则主要表现为屈骚精神社会的一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屈骚精神自我与社会这两方面的内涵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正统以及伦理道德观念之阐释的烙印。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至建国前，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对屈骚精神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对屈骚精神的探讨可以说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梁启超云：“司马光谓屈原‘过于中庸，不可以训’。故所作《通鉴》，削原事不载。屈原性格诚为极端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①梁启超指出了屈子在社会中、在他的生命中所表现出的极矛盾的两面，这两面就是理想与现实的交战，屈子最终也只能以自杀来结束这终生的交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梁先生看

^① 陈引驰《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78页。

出了屈骚精神中自我与社会既冲突又追求契合的矛盾性。

闻一多先生在批判孙次舟认为屈原是“文学弄臣”论调的同时,对“屈骚精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当怎样估计过去的每一个伟大艺术家呢?高尔基指示我们说,应该从两方面来着眼,一方面是作为‘他自己的时代之子’,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如果我也是个‘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别从这一方面上着眼来崇拜他的。”^①闻一多对屈骚精神作了两个方面的概括,即屈骚精神包含“集体精神”与“个人精神”两个方面,而尤其推崇屈原的个人精神。可以看出,闻一多这两方面的概括是对以往屈骚精神研究的超越,洗却了笼罩在屈骚精神之上的封建伦理与道德观念,强调了屈骚精神的个性特征,赋予了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内涵。

令人遗憾的是,梁启超、闻一多等先生,他们更多的是结合时代,结合文艺论争,对屈骚精神作一感悟似的议论,虽然他们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当代的思想,给屈骚精神以超越前人的评价与推崇,但是对这一精神的探讨尚未深入。而至二十世纪五、

^① 《闻一多全集》第五册《楚辞编·屈原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6—27页。

六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屈骚精神的探讨又未能从这一角度延续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对屈原思想是属于儒家、道家亦或法家的争论,争论的背后包含着评论者评价标准及思想的单一,当然屈骚精神的丰富性也就势必淹没在思想归属的争论中,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被充实以人民性等内容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至八十年代,屈学界最为引人注目的论战之一就是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思,这一论战反映了人们在突破对屈原较为单一评价的定式的同时,试图打开屈骚精神这一迷宫、饱览丰富多彩的屈骚精神的强烈渴望。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已逐渐形成一种多元的趋势,从正统的思想、人格评价走向屈骚的个性精神、理性精神甚至潜意识等领域的探讨,而在这多元的评价中又形成一种包容的趋势。赵辉先生《楚辞文化背景研究》一书,对屈骚精神研究进行反思后认为:“在世界上,人是最为复杂的。而人的复杂,全在于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复杂。文学作为人的心灵的产物,它所表现的精神也必然不是单一的。伟大的作家的作品更是如此。屈骚的思想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复杂的,对于读者有着‘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不同效果。‘屈骚精神’,既包含着爱国忧民的思想,又包含着诗人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由之而带来的历史使命感和对于现实社会、民族、个人命运的深沉忧患;同时,也包含着诗人为自我实现、自我人格完善而甘愿承受现实不平而带来的一切痛苦的折磨那种强烈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全立体结构。我们反对将问题复杂化,但任何将‘屈骚精神’片面化、简单化的看法也是

不可取的。”^①但是这种把屈骚精神视为“一个多层次的全立体的结构”，除了展示屈骚精神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包容性之外，对屈骚精神这一“多层次的全立体的结构”的基础或者说是基点是什么则未能给予一恰当的诠释。如果不能说明支撑这一全立体结构的基点，那么这一多层次的全立体的结构就不能作为一整体，而只是各种精神的拼凑或者说是各种思想翻版的一种组合。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潘啸龙先生继承闻一多先生的观点而对屈骚精神又作了新的概括，认为“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其实统一的‘屈原精神’，即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抗争精神’和不为任何挫折而移易的‘忠贞精神’”^②。

由以上我们对屈骚精神研究的历史反思可见，从汉至今，对屈骚精神的探讨始终是在争论中展开的，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屈子的个性精神和爱国精神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其实最为本质地反映了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对屈骚精神的或褒或扬，始终未能离开这两个方面的视角。近代以前，主要表现为或将二者对立如班固，或以社会性兼融个体性如王逸。或对立或兼融都未能对个体性、社会性给予恰当的评价，都表现出以社会性取代个体性的倾向。闻一多等先生能将二者分开，指出屈子身上兼有两种精神，即“集体精神”与“个人精神”，给屈子的个人精神以相对于集体精神而存在的地位，这无疑是研究视点上的一个提高。但是这二者在屈子身上又不可能是各自独立而不含融的精神存在，而表现出对自我和社会双重固持的精神基点，

① 赵辉《楚辞文化背景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07—108页。

② 潘啸龙《历史的改塑和发现——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见《楚汉文学综论》黄山书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0页。

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

表现出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屈骚精神这一基点最为本质地反映了人类于自我于社会的精神需求,这是我们对屈骚精神反思所得到的启示,也是屈骚精神之所以能沾溉后世、后世之所以对屈骚精神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

本书上编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屈骚精神进行新的阐释,对屈骚精神所体现的“集体精神”与“个性精神”进行作品的综合研究。《离骚》、《九章》、《卜居》、《渔父》是一组,这一组作品是与屈原自身经历有关的诗作。长诗《离骚》首先体现了诗人对自我才能的高度自信。不论从开篇的追述祖先,交待皇考为己命名的期望以及诗人日后的不断修持,都表现出诗人对自我才能、品质持有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高度自信,而这一高度自信又是和诗人强烈的用世之心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诗人把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投注到了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自我意识因蕴含了社会价值而显得崇高,也显得更加富有理性。更进一步,诗人表现出了一种强烈地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执著精神。从“来吾导夫先路”的表白,到“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再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矢志,都可以看出诗人为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执著精神与追求意志。诗人在现实政治中遭受挫折后,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寻求“两美契合”(即自我与社会契合)的途径。屈原与楚国“同宗共国”的特有情感,使得他在寻求“两美契合”的途径中举步维艰,或者说,他的宗国之情,使得“两美契合”除却楚国之外,只是一种奢望。而当楚君昏庸,“两美契合”在楚国破灭之后,诗人只能发出“国无人莫我知兮,人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悲叹。因而屈子纵身汨罗,恰恰是以最为极端的死的方式表达了对自我精神的承诺与践履。可以说,在与《离骚》同类的作品如《九章》、《卜居》、《渔父》等诗篇中,都可以看到屈子的一

生——从少年到壮年再至暮年直至生命结束的整个历程——是其对自我精神坚守与实践的一生，在其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都有屈骚精神基点的展示。《天问》表现了屈子的天人之思。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看，屈子的天人之思应是支持屈骚精神产生的哲学基础。虽然《天问》不像《离骚》那样直接以抒发自我情感为主，但是《天问》所发出的对宇宙自然之天、运命人格之天的质疑并由此表现的对楚国国运的担忧，与屈骚精神的基点声息相通，并让我们从屈赋中最为深切地感受到屈骚精神的产生自有他深厚的哲学意蕴。正由于屈子对自然、社会有如此不同于时俗的看法，才使得屈子精神表现出深邃的哲学基础，并支持了屈骚精神基点产生的可能。如果说《离骚》等篇章及《天问》与屈子的情感与精神联系还较密切的话，那么《九歌》祭神娱神的巫祭特色，似与屈骚精神的基质水火不容。一个对自我与社会如此执著的诗人，如何对《九歌》如此钟情，并为此改作？《九歌》是屈原在民歌基础上的再创造，主要借助神与神或神与巫的感情故事，见出人类丰富感情的理性体验，隐含着“两美契合”的感悟，既非远古的敬神，亦非后世的褻神。也就是说，屈骚精神的基点正是在《九歌》祭神娱神的宗教情绪与宗教认知方式上达成了一致。就具体内容而言，屈骚精神对自我与社会双重固持的基点，诗作中所表现出的基本内涵，诸如民族精神与统一意识的交融以及儒法合流的政治思想、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与改革精神、“美政”思想的自我实践精神等等，无不从各个方面展示了屈骚精神基点的渗透。由于这些方面更多涉及屈骚精神的文化层面的表现，所以我们将对屈骚精神的具体内涵的阐释，放在下编探讨屈骚精神产生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讨论。

对屈骚精神的理解总是与探讨屈骚精神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虽然从汉至现代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有一个不断深